

章太炎国学的东学渊源

史少博

内容提要 近代中国的国学界,普遍把近代日本的学术称之为“东学”,而章太炎的“国学”与日本近代明治时期的学术有密切的关系,故有其深刻的东学渊源。章太炎曾多次去日本,阅读了大量日本书籍,在日本期间接触了明治思潮,又从日本书籍中吸取了大量的西洋近代思想,例如章太炎对姉崎正治等日本学者的著作进行翻译、并对日本学者的基本概念进行借用,章太炎著作《噫言》里,就可以看出大量地吸取了西洋近代思想。但是到了《民报》时期,章太炎对待西洋近代思想的态度从接受转变到批判,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由此,章太炎的“国学”,是在通过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,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态度从吸取,转向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批判后的“回归”,章太炎的“国学”不单单是回归到过去中国古典文化,而是结合当时近代中国现实,经历对西方近代思想的吸取与批判后,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精神的再发现。

关键词 章太炎 国学 东学 媒介 渊源

史少博,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710126

章太炎一生数次东渡日本。留日期间的章太炎其思想深受明治时期思想的影响,因此章太炎“国学”与日本学术有深刻的关系。又因为近代中国的国学界,普遍地把近代日本的学术称之为“东学”,那么,分析近代章太炎国学与日本学术的渊源,也可以称为分析章太炎国学的东学渊源。

一、章太炎以近代日本为媒介积极吸取西洋近代思想时期

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,基本上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体系。“中国古代以来,具有强烈的中华意识。所谓中华意识,就是以中华自己为世界的中心,不承认中国与异民族的对等性,所以中国吸取西洋文明这方面的意识有很大的障碍。……中华意识,是通过儒教强烈表现出来的民族标志,儒教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来说,从宇宙论到政治论、伦理的认识问题,具有广泛的实际意义,以儒教为核心的文化体系的绝对性是不容置疑的,中华意识自然不能消失。但是进入十九世纪,中国接触了西洋的近代

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“中国近代的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”(项目编号:15XZX005)阶段性成果。

世界,中华意识被迫发生变化。……然而必须明确,章炳麟是通过以日本为中介摄取西洋近代思想的。……中国摄取西洋文明的契机,是鸦片战争的失败。”^[1]中日甲午战争,中国失败后,大批中国留学生前往日本,中国文人通过日本为媒介也更加了解了西方文化,日本学者小林武认为:“中国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摄取,是日清战争后急激进行的,经历了鸦片战后大约五十年,需要时间也是当然的。”^[2]章太炎在《葑汉微言》中也说:“既出狱,东走日本,尽瘁光复之业,鞅掌余闲,旁览彼土所译希腊、德意志哲人之书。”^[3]

章太炎吸取西方近代思想,是以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为媒介的。日本学者小林武考证:章太炎去日本三次,吸收日本的近代思想,与章太炎去日本有直接的关系:“章炳麟读日本书,是他来日本为直接契机,他来日本三次。变法运动挫折后,一八九八年六月到八月,一九〇二年二月到七月,还有他因《苏报》事件(一九〇三)入狱三年后,一九〇六年六月开始到一九一一年十一月,共三次。章炳麟在日本期间接触了明治思潮,从日本书籍中吸取了大量的西洋近代思想。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年他吸取外来思想在其著作《诂言》(重订本)中反映出来,这个时期可以称为《诂言》期。”^[4]小林武又考证:“章炳麟以二度来日本(一九〇二年二月到七月)为契机,并且以日本书籍为媒介吸收了西洋近代思想,我们发现《诂言》(重订本)中引用西洋近代思想的分量,明显比以前增多,而且《诂言》初刻本与重订本中接受西洋近代思想也明显的相异。……在《诂言》初刻本中,直接言及日本人与日本书的地方,只有冈本监辅。……《诂言》重订本中引用的日本书有冈本监辅的《万国史记》(明治一二);远藤隆吉的《支那哲学史》(明治三三);白河次郎、国府种德合著的《支那文明史》;远藤隆吉的译著《社会学》(明治三三);有贺长雄的《宗教进化论》(明治十六)、《族制进化论》(明治二三);……户水宽人的《春秋时代楚国相续法》(明治三一);乘竹孝太郎译述的《社会学之原理》(明治十八);洪江保的《希腊罗马文学史》(明治十四);武岛又次郎的《修辞学》(明治三一);藤井宇平翻译的《婚姻进化论》(明治二九);姉崎正治的《宗教学概论》(明治三三)、《上世印度宗教史》(明治三三);等等。我们看出:章炳麟关心的学术范围,扩展到中国哲学以外的社会学、历史学、修辞学、文学、宗教学等等。章炳麟在引用这些书籍的时候,还补充了自己的议论,引用日本书籍并且增加了自己的看法的地方,《诂言》重订本中有三十处,而在《诂言》初刻本中只有五处。并且在《诂言》重订本中关于以日本书为媒介的西洋近代思想的知识,比初刻本大约增加了八倍,这是他广泛地阅读日本书籍,贪婪地吸收西洋近代思想的结果。并且章炳麟引用日本的书籍,明治三〇年(一八九七)前后出版的新书居多。……《诂言》重订本引用的日本书,不仅数量上比初刻本大幅度地增多、内容更加广泛,而且质也更加深入。如何深入的,我们可以透过章炳麟引用日本书的地方进行考察,例如《订文篇 附正名杂义》,在《诂言》重订本中引用篇幅最长的是洪江保的《希腊罗马文学史》,章炳麟以此书为依据,说明了中国与西洋古代表现的共通性,依据洪江保的论述,韵文比散文先成立,历史学比哲学先成立,这种观点章炳麟赞成并引用了日本学者洪江保的观点,在韵文中史诗(叙事诗)先成立,然后是乐诗,最后是舞诗(戏曲)……写尧舜之事的书即使押韵,也与诗不一样。春秋时代以后,历史书都不押韵,哲学与演说也无韵,这样的中国古代文化,是参照西洋的事例整理的。”^[5]

章太炎在其学术著作中,还借用日本学者的基本概念,例如章太炎对姉崎正治著作的翻译与基本概念的借用。“在《诂言》的前述中,引用了姉崎正治《宗教学概论》的地方有五处、引用《上世印度宗教史》的地方有三处,姉崎正治对章炳麟的影响,与其他日本人的著作(第一节)相比大的多,因为其一引

[1][2][4][5][日]小林武:《章炳麟と 明治思潮》,〔東京〕山本書店出版部2006年版,第15-19頁,第21頁,第45頁,第50-53頁。

[3]莫中、董国炎:《章太炎学术年谱》,〔太原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,第252页。

用姉崎正治著作的地方多到八处。其二,从姉崎正治获得的知识不是断章取义,是借用了其基本概念也进行了自己的议论。其三,对姉崎正治论文的大约三分之一进行了全译,也借用了其论述的结构。首先看一下章炳麟的翻译方法,《馥言》从《上世印度宗教史》到古代印度宗教的知识以外,对心灵术到印度思想相结合的神知学也进行了直译,可以看出,章炳麟对姉崎正治著作的引用与其他日本书的引用相比直译的多,例如引用有贺长雄《宗教进化论》的时候,在《馥言》原教下篇中,也只是翻译了其大意三十余字,在序种姓上篇中也只是对未开化社会的图腾知识断章取义地引用。章炳麟对岸本能武太《社会学》翻译成中国语的场合,也不是直译,只是对原文的大意进行了简洁的翻译,但是,章炳麟在引用《宗教学概论》的时候,在《馥言》通译篇直译成中文的大约二百九十余字,在订文篇中直译成中文的约二百六十字,章炳麟对姉崎正治著作的直译,在《馥言》中对日本书中是引人注目的,姉崎正治的学说可能正是章炳麟论述有力的论据吧。”^[1]

章炳麟积极地吸取西洋近代思想,表现于主要著作《齐物论释》中,《齐物论释》使用中国古典研究的技法,使佛教与庄子相结合,并且在与西洋近代哲学的碰撞中展开了自己的哲学。可以说西洋近代思想,对于章炳麟思想的形成是不可欠缺的。“章炳麟以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为研究中心,可以说他是传统学术的大家和民族主义者,总起来说,章炳麟是在中国知识的闭锁体系中考察的,但是从其思想与西洋近代思想的关系的角度分析,认为章炳麟思想中西洋近代思想不可欠缺,是因为他在世界范围的知识体系中重新捕获的结果。当时的中国,不是直接接受西洋近代思想,而是以明治日本为中介接受了西洋近代的思想,并且认识到不能无视全世界的知识环境,当然章炳麟也如此。”^[2]

二、章太炎以日本明治时期思想为媒介批判西洋近代思想时期

章太炎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,经过对西洋近代思想的汲取过程,到《民报》时期就转化为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批判。正如日本学者分析:“章炳麟在《馥言》里大量地吸取了西洋近代思想,但是到了《民报》时期,对待西洋近代思想的态度从接受转变到批判,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例如在《齐物论释》(一九一〇),我们就看到了对佛教批判性的观点,从此开始,章炳麟超越了吸收西洋近代思想的阶段,显示出他开始使自己的思想体系化。很明确,章炳麟没有形成像《馥言》时期那样一味地吸取西洋近代思想局面,而是以《馥言》时期吸取的西洋近代思想与印度哲学等为批判的媒介,对姉崎正治的概念进行了再利用。而《民报》时期,章炳麟如何对西洋近代思想进行批判性接受的呢?明治思潮又起了多大的作用呢?从其‘自主’思想与‘厌世观’可以看出,‘自主’思想,显示了章炳麟的独自的立场,阐释了从集体到自由个人的应有状态,具有对‘liberty’(自由)的语感,这种思想,一方面是对近代‘自由’的中国式的阐释,另一方面对西洋的价值观进行了批判,而‘自主’的语感,来源于明治时期的日本书。又章炳麟的厌世,其主要表现在对‘五无论’等阐释中,与他来日本后明治三十年代初,流行的厌世观有关系。明治时期的‘厌世观’章炳麟常常言及,其思想也与叔本华有很深的关系,叔本华的‘意识’及共同情感论,为章炳麟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,可以说章炳麟是以明治思潮为媒介获得的智慧性感发。……当然,也与中江兆民翻译的《道德大原论》有密切的关系。”^[3]章太炎通过日本学者翻译的著作接触了叔本华的思想,并且在经过自己的研究后,对叔本华的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进行了批判。“章炳麟《答铁铮》(一九〇七年六月)中,批判了叔本华的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。他说‘我认为叔本华所说的道德,是伪道德’。……章炳麟对西洋近代的道德进行了批判,认为西洋近代的道德是‘伪道德’,是

[1][2][3][日]小林武:《章炳麟と 明治思潮》,〔東京〕山本書店出版部2006年版,第76-77頁,第40-41頁,第89-90頁。

以批判叔本华伦理学说的功利主义为触发点吧。中国的状况,当时当然不是市民社会,产业化的功能也极其微弱。明治三〇年的风潮中,日本摸索革命道德的思想也给予了章炳麟很大的刺激。”^[1]

章太炎借助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了解柏拉图、康德、斯宾诺莎等近代西方思想家。“明治时期,开始着手研究康德(章炳麟关于西洋哲学的知识,是以明治哲学为媒介的),例如指导当时哲学界的井上哲次郎(一八五五~一九四四)讲习康德与叔本华。……井上哲次郎给予章炳麟很大影响。”^[2]章太炎以日本明治思想研究为媒介,在了解西方近代思想的基础上,并且对许多近代思想家的思想都进行了批判,例如对康德“神之有无,超越人的认识范围之外”的对“神”的不可知论,章太炎说:“物者,五官所感觉;我者,自内所证知。此其根底坚牢,固难骤破。而神者,非由现量,亦非自证,直由比量而知。若物若我,皆具生执,而神则为分别执。则以分别而成,则亦可以分别而破。”^[3]章太炎还批判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等等。

章太炎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批判西方近代思想,也是以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的。“章炳麟是作为一名民族主义的考证学者吸取西洋的近代思想,到最后又对西洋近代思想进行了批判。……章炳麟从开始摄取西洋近代思想,到最后步入对西洋近代思想的转变,可以说无疑是使异文化内化的过程,从摄取到对抗态度的转变,与政治立场的变化相比,使对比概念考察的结果,章炳麟的民族主义立场,基本上是具有—贯性的。因为中国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体系,所以不得不看清楚自己与他人的异同。章炳麟自我哲学的形成过程,重叠了概念批判性的考察,这也是中国古典解释学有效的功能。”^[4]

三、章太炎以近代日本为媒介经过两次思想转变回归到“国学”

章太炎的“国学”,是在通过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,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态度从吸取,转向批判后的“回归”,章太炎的“国学”不单单是回归到过去中国古典文化,而是结合当时近代中国现实,以及经过对西方近代思想的吸取与批判后,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精神的再发现。正如日本学者在阐释章太炎的著作《齐物论释》时所说:“章炳麟把对围绕庄子思想核心的‘内圣外王’思想和实在的基本理解,并且与西洋近代哲学思想及明治哲学进行对照,而对中国精神的独自性再发现的成果。这不单是过去的回归,而是在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,对西洋近代思想吸取、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。”^[5]日本学者分析:“由于《苏报》事件入狱以接触佛教为契机,思想发生了转换,一九〇六年以后即使民报时期,也吸取了不少西洋近代思想,只是在吸取西洋近代思想过程中,呈现出了对西洋近代思想的批判,于是,他的思想回归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国学。”^[6]然而,章炳麟提倡国学以后,对西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,西洋的事例不再言及。例如《国故论衡》(一九〇一)文学综略是‘文’与‘笔’,韵文与散文的概念不再论述,也没有涉江流的论述。”^[7]

中江兆民1847年出生,他没有被当时日本“脱亚入欧”风靡一时的风潮所诱惑,从日本民族的角度考虑问题,批判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。章太炎受到中江兆民等日本学者很大影响,从开始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汲取西方近代思想,到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批判地汲取西方近代思想,然后回归到自己国家的“国学”。“为了对抗欧洲文化,章太炎重新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化,于是提倡‘国学’。太炎开始时对欧洲文化无知也没拒绝,他还接受了欧洲文化的洗礼,例如初期的《膏兰室札记》等,《廛书》中也能看到欧洲文化对他的影响。太炎通过发掘传统的中统合民族的不动摇的民族之魂,与欧洲的

[1][2][4][5][6][7][日]小林武:《章炳麟と明治思潮》,〔東京〕山本書店出版部2006年版,第114-116頁,第154頁,第41-42頁,第126頁,第45頁,第53頁。

[3]姜盼:《革故鼎新的哲理—章太炎文选》,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,第150页。

对抗意识增强,思想发生了回转,他认为‘国学’是围绕民族精神、能引导彻底革命运动之学。”^[1]“章太炎主张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,反对崇洋媚外。中国首先要学习中国文化,但也不应当拒绝优秀的外来文化。他对当时崇拜西方文化乃至主张全盘西化的潮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。他说‘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,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,所以自甘曝弃,说中国必定灭亡,黄种必定剿绝。’章太炎指出,如此盲目媚外,自暴自弃,是非常有害的。……章太炎提倡国粹,他说……‘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,有几分涉猎,都是皮毛。凭他说好坏,都不能作定论’。”^[2]章太炎受当时时局的影响,不能再沉浸在考据学中,时代要求促使他参加了变法运动,因为他深深感到了亡国的危险,当时的形势促使他关注政治,并且在国家政治性的危难中,还写出了《国故论衡》等著名著作。

中江兆民的《道德大原论》对章炳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,小林武指出:“中江兆民翻译的《道德大原论》中,利他性的行为原论给予章炳麟很大的刺激。”^[3]“章炳麟积极吸取西洋近代思想的《诂言》时期,与强烈地批判西洋近代时期,可以看出,吸取与批判,意味着两件事,其一,作为古典研究大家的章炳麟,开始了使中国相对化,即使他对中国古典多么难的论述,也没有把中国的精神世界的优先位置作为理所当然的前提,在更广阔的世界中重新认识中国,以对西洋近代思想的批判为诱发,再发现中国精神的独自世界,流入对西洋文明的对抗,目标是复兴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,这样的功能,可以看作是文化运动,他主导形成了国学运动。”^[4]

虽然章太炎没有明确地把“国学”定义为“国故学”,但在一定意义上,章太炎把“国学”看作国故之学,并且写有著名的著作《国故论衡》。“国故”被认为包括中国一切历史与文化。章太炎在其著作《国故论衡》,分了上卷小学十一章、中卷文学七篇、下卷诸子学九篇三个部分来论述,在章太炎的“国学”中,讲“小学”是必不可少的,章太炎认为“小学”是“国故”之本。“盖小学者,国故之本,王教之端,上以推校先典,下以宜民便俗。”^[5]“太炎先生的小学成就,还在于他把语言文字学作为宣传爱国思想,激发民族自尊心的一个重要内容,作为振兴民族文化,挽救祖国命运的一个重要手段,即他一贯提倡的‘以国粹激动种性,增进爱国的热肠’,这‘国粹’就是他所说的祖国历史一语言文字、典章制度、人物事迹及风俗。”^[6]章太炎《诂言》中有学术史的内容。“章太炎开其端,在其1899年辑订的《诂言》初刻本中,便已有论述学术史的内容。1902年删节修订《诂言》时,更是增加了不少论述历代学术、思想演变的内容,此后又陆续有与学术史相关的论著问世。……清代学术涵盖领域甚广,举凡经学、史学、子学、小学、地理、金石、天文、历算等皆在其范围之内。但其特色为考据,考据学是清一代的标志性学问。……实在讲来,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。”^[7]“太炎研修经学、小学、史学等。经学是儒教经典的解释学,他通过研究《春秋左传》,写了《春秋左传读》与《春秋左传氏疑义答问》等著作,属于戴震—王念孙·王引之一俞越等皖派经学的系谱。小学是指以经典研究为基础的传统性语学,有音韵、训诂、文字,他著有《新方言》、《文始》等学术史著作。史学是关于制度、文物等历史性研究的学问。太炎是从儒教经典的历史形成为研究契入点的,并且关注了诸子学。清末诸子学复活了近百年,研究重点以训诂为主的探讨转移到以思想内容吟味的研究。太炎的《诂书》、《齐物论释》等是清末诸子学的代表,被胡适赞为‘空前的著作’。”^[8]

章太炎的“国学”,研究范围很广,不仅对庄子研究的《齐物论释》著名,而且对老子、管子等都有研

[1][8][日]佐藤慎一编:《近代中国の思索者たち》,〔東京〕大修館書店1998年版,第94頁,第91-92頁。

[2]华强:《章太炎大传》,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,第299-300页。

[3][4][日]小林武:《章炳麟と 明治思潮》,〔東京〕山本書店出版部2006年版,第86頁,第125頁。

[5][6]章太炎:《国故论衡》,〔北京〕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,第6页,第276页。

[7]李帆:《章太炎、刘师培、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》,〔北京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,第6-11页。

究。例如章太炎研究老子时候说:“至于老子之道最高之处,第一看出‘常’字,第二看出‘无’字,第三发明‘无我’,第四倡立‘无所得’三字,为道德之极则。”^[1]章太炎研究管子时候指出:“《管子·戒》第二十六‘孝弟者之祖也’。祖与本同,有子乃述管子之语耳。……试问如何爱国?爱国者,爱一国之人民耳。爱国之念,由必爱父母兄弟而起。父母兄弟不能爱,何能爱一国人民哉?由此可知孝弟为仁之本,语非虚作。”^[2]

章太炎讲国学,他自己认为只是指示些门径和矫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^[3]。章太炎讲国学有时还把国学分为两个大部分,第一部分讲“国学”之本体,在讲述“国学”之本体时强调“经史非神话”、“经典诸子非宗教”、“历史非小说传奇”。章太炎把国学之派别分为:经学之派别、哲学之派别、文学之派别。由此也可以看出章太炎把经学、哲学、文学都归属于“国学”。1922年4月到6月之间,章太炎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的“国学”演讲。曹聚仁聆听章太炎的演讲做了笔录,并出版了《国学概论》,曹聚仁在《国学概论》小识中说:“国学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。我们过去的智识,和他发生密切的因果关系;因此我们急要明白:国学的精华何在?他以后还有存在的价值没有?如果国学是腐败的骸骨,不该容他存留着,我们可赶快荡除净尽;如其中尚包藏着精金,也应从速发掘;决不可彷徨歧路,靡所适从。在取舍问题急待解决当中,非研究国学,别无解决的途径。这是第一层原因。在我们以前,既没人曾把国学整理一下,到现在还仿佛一大堆乱书:政治、哲学、伦理、宗教,以及其他各种科学都包含着。我们既要明白其中究竟是怎样的,非坐待可以得到;及今用精力把他系统地整理起来,或者能够观察明白,使后人也得着好处。所以谋学术界的共同便利,也非将国学研究一下不可。这是第二层原因。大部分青年感受着无限的苦痛:因为心里极明白适合人生真义的‘新’,要想接受他;但社会上‘旧’的势力澎湃到极点,稍一反动,灵肉两方面都得着痛苦。那旧的也不过借国学做护符——军阀和老顽固都把孔老夫子来撑门面——国学经过他们手里,已变成‘糟粕形式、呆板教条’了。我们如不把国学的真面目抬出,他们决不敛形息声的;要找出国学的真面目,自然须下一番研究工夫。这是第三层原因。我们对于西方文化固当合理的迎纳,但自己背后还有国学站着;这两种文化究竟如何使他沟通,也是目前要解决的问题。我们对于国学所含的原子不明白分析出来,如何能叫彼和别种化合?所以要先研究国学,才找得出沟通方法。这是第四层原因。”^[4]

总之,章太炎“国学”的东学渊源,也可以用日本学者的论述概括:“章炳麟的思想轨迹,总的来说是以对中国古典研究为基础,以明治思潮为媒介对西洋近代思想的吸收、对西洋近代思想批判性的理解,到对西洋近代思想的对抗为步骤的。……总之,在古典学者章炳麟的思想中,深深刻上了近代性的烙印。”^[5]

〔责任编辑:肖 波〕

[1][2]章太炎:《章太炎讲国学》,〔长春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,第23页,第2页。

[3]梁启超、章太炎、朱自清:《三大师谈国学》,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,第121页。

[4]章太炎口述、曹聚仁笔译、武田熙日译:《国学概论》(中文日文对照本),〔香港〕南天书业公司1971年版,第166页。

[5][日]小林武:《章炳麟と 明治思潮》,〔東京〕山本書店出版部2006年版,第186頁。